

中国人气质

面子 节俭 勤劳 缺乏时间观念
忽视精确 误解的才能 欺瞒的
才能 柔顺的顽固性 智力混沌
麻木不仁 缺乏公共
不讲究舒适和方
便 生命力 精神 守旧
知足长乐 孝心
心 社会台风 连
受法 互相牵连
信 多神论 泛神 互相猜疑缺乏
前需要 面子 节俭 勤劳 缺乏时间观念
能 欺瞒的才能 柔顺的顽固性 智力混沌



◎〔美〕亚瑟·亨·史密斯
◎张梦阳 王雨川

敦煌文艺出版社

[美]亚瑟·亨·史密斯

●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中 国 人 气 质

本书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pyright 1894, By FLEMING H · REVELL COMPANY

(《中国人气质》，美国佛莱明公司 1894 年纽约版)

译出

书 名 《中国人气质》

作 者 [美] 亚瑟·亨·史密斯 著 张梦阳 王丽娟 译

责任编辑 侯润章

封面设计 任 伟

版式设计 邓争旗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印 刷 兰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 印张 10.375 字数 225,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30,000

ISBN 7-80587-305-4/I · 269

定 价 15.6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鲁迅先生在逝世前十四天发表的
《“立此存照”（三）》一文结尾语重心
长地说——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
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
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
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
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
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
国~~人~~。

四海之内皆兄弟。

——孔夫子《论语》

关于人的科学研究是所有学问
中最艰深的一门学科。

——欧·文·霍姆斯

我们坚信这样的格言——在指出一个人的缺点之前首先看到他的优点。这对于正确地判断任何人和事都是有益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卡莱尔

序

唐 弢

继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后，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中文译名《困惑的外交官》）、高桥敷写的《丑陋的日本人》，也先后译成中文出版了。后两本书曾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被提及，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比较全面的介绍，也是柏杨用以自辩的客观的凭证。听说问题还有争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可惜我没有读到有关文章。当然，以偏概全是不对的，不应当将个别缺点看成是全民族的缺点；但由于作者都是本国人的，池鱼故渊，知之深而望之切，我禁不住想起鲁迅说过的话，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得多好啊！

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书，对于厨川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的批评，“禁不住称快”；并且认为同是立国亚东，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厨川所狙击的要害，“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

看来这也是鲁迅之所以介绍《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倘有人以为鲁迅苛责自己，怀有民族自卑感，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别人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荒谬狂悖的言词，鲁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反驳和狙击。在《马上支日记》里，在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言里，对于自命为“支那通”的日本人进行了嘲笑：“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至于安冈秀夫扬言江浙人大吃竹笋，是“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属于色情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的一种表现，鲁迅对这些胡说八道的“支那通”更是嗤之以鼻，引为笑谈。但对于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不管谈话的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总是认真对待的。例如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 H. Smith. 1845——1932）所著的这本《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就以赞赏的口气一再提到它。

鲁迅认为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逝世前十四天，他在《“立此存照”（三）》里谈到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时候，重申前请，希望有人将这本《中国人气质》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劝人们把史密斯的书当作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

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

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长乐。鲁迅最反对的是那种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人，他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他反对知足长乐，认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为此以讽刺的笔调写了《安贫乐道法》。至于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鲁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的病根，他就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人杀头的情景，这才中止学医的，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在中篇《阿Q正传》和短篇《示众》里，都曾形象地描绘了欣赏杀头的麻木而无知的群众的场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评中国人浪费时间、提倡忍受、猜忌连坐、繁文缛节……也都可以鲁迅的文章里找到鞭挞的痕迹。史密斯同时讲了一些中国民族性的优点，如勤劳、节俭等等，显然，他批评的缺点有些也难以使人同意，鲁迅并没有全部接受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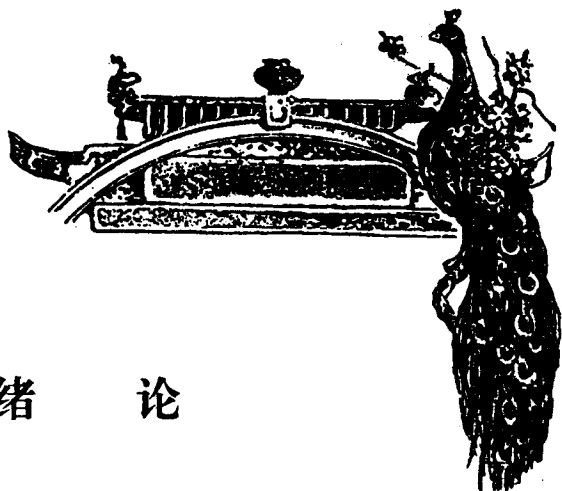
鲁迅曾称猛烈地攻击本国缺点的厨川白村为“霹雳手”，并认为他所狙击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但他又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瑕中觅瑜，将两者对照一下，很可以看出他重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从年轻时阅读它，到晚年仍希望有人

将它译出的本意了。在我们眼前展示着一颗永远跳动着的伟大的心。

现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已由张梦阳等同志译出，并即将由出版社出版了。不仅鲁迅的期待得到满足，而且经过分析、自省，“明白那几点说的对”，正可以作为变革的参考。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不论有多大缺点，我们“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88年4月12日

082906



绪 论

知情者出面作证，人们总希望他陈述真情，而且是全部真情，除真情之外，别无其它。许多接触过中国人的知情者，已经述说了中国人的真实情况，然而他们当中或许很少有人能够只讲真情，不掺水分，更没有人讲述过中国人的全部真情。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博学广识，都不可能了解有关中国人的全部真情。所以，这卷书里的论文，要坦然正视来自三个不同方面的异议。

首先，人们也许会说，谁试图把他关于中国人特性的印象转述给其他人，那么他将是枉费心机。乔治·温格罗夫·库克 (George Wingrove Cooke) 先生，一位伦敦《泰晤士报》1857 至 1858 年驻中国的通讯记者，可以像那时到中国去的任何一位作家那样，有良

好的机会观察各种条件下的中国人，并且能够得到那些资深望重者的帮助，借助那些人的观察获得对中国人的正确理解。然而库克先生在他书信集的前言中，对他描述中国人特性的失败表示了歉意：“在这些书信里，我没有采用精心描述中国人特性的文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的诱惑力，没有一个课题像这个一样，能有更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可以充分使用精巧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堂皇的教义。所有末流的批评家，都可能断然地蔑视我，因为我未利用这样的机会，总结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事实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我写了几点中国人的优良特性，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写作这些文章的同时，眼前的中国人又以他们的言行粗鲁地违拗了我的假说，为了真实起见，我连续烧了好几封信。而且，我常和最著名而且坦诚的汉学家们谈起这件事，发现他们和我一样，认为从总体上以一个观念概括中国人的特性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困难仅仅是那些实际上了解中国的汉学家才感觉到的；一个玲珑的作家，对所写的课题全然一无所知，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一篇词藻华丽但却与事实正相违背的分析文章，虽然这种分析应该是严格真实，不附加主观臆想的。某一天，或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抓住中国人心中每个稍纵即逝的矛盾心理，估价其在总体中的分量与影响。目前，至少可以满意的是，我避免严格的定性，只是用最突出的品性描述中国人（a Chinaman ①）。”

① 原注：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甚至遗憾的事情，“a 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地植根在英语中，而把更恰当的词语——Chinese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哪一个是不用“Chinaman”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这一词语。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人已经使他自己成为许多国家事务中的一个因素。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不能压服的；也可以感到，他们又是不易被理解的。实际上，除非在中国，在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可能正确地了解中国人，然而依然盛行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是一组无法完全理解的矛盾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与中国交往的几百年已经逝去，我们终究没有明白地解释这样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至今不能像认识复杂现象的其它秘密那样，真正认识中国这个民族。

对这卷书的另一个更为严肃的异议，是作者不具备写这书的资格。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个事实，并不能保证他有能力写书论述中国人的气质，就如一个人在银矿滚打了二十二年，并不足以证明他适于写作一篇关于冶钱或者金银二本位币制的论文。中国幅员辽阔，一个从未走访过她一半以上的省份、而只在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整个帝国作出概括。这些文章最初是为上海的《北部中国每日新闻》（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写的，无意广泛传播。然而，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大不列颠、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兴趣，作者应要求把这些文章重新编写成书。^①

第三点异议，是一些人提出的，认为阐发的部分观点，特别是那些关于中国人伦理特性的看法，会引人误入迷途，产生错误判断。

然而，应该记住，人的印象不能如统计表那样，可以精确到分毫不差。它们就如相片底版，没有两张底版是完全相同的，可

① 原注：《中国人气质》，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在中国和东方广泛传播，两年前售空。

是每张都可以真实地映现一些其它底版无法呈现的图像。相片的底版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又不同，结果相片也就不相同了。

许多久居中国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作者，他们与作者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另外一些人的判断也理应同样受到尊重，想来在一定部位增添一点儿更明亮的色彩，可以使过于单调的画面更为逼真。无疑，考虑到这些正确的意见，这本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然而这次出版急迫，原本讨论中国人气质的三分之一篇幅被省去了，但是仍然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写了“知足长乐”一章。

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赞美中国人所具备并显露出的优点。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危险，这就是屈从于既定的看法，给予中国人超过实际的道德荣誉——这是一种比不分皂白地贬低还严重的有害做法。由此联想到萨克雷，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笨的，坏人却是聪明的。对于这个问题，这位伟大讽刺家的回答是：他有眼无心，没有深入思考眼见的事物。譬如有一幅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发现拿破仑在圣·赫勒拉岛的侧身像，低头抱臂站着。但是长时间注视之后，往往看不出任何这样的侧身像了，似乎其中必定有错，而一经清晰地指出，就会感到看见画而看不出拿破仑是不可能的。按照同样道理，许多事情在中国第一次出现时，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而一经看出，便经久不忘。

把一个限制性的分句，引进所有概括性的总句是不可能的。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不要以为这些文章企图概括整个帝国，也不要以为是外国人观察和体验的全面荟萃。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所得印象的记录，是许多种“中国人气质”中的一小部分。它们不是一幅中国民族的肖像画，而是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见

闻，用炭笔勾勒的一幅中国民族一些特性的素描。图像仅仅是由单线构成，无数单线交织在一起，要求形成完整的白色光幅。它们也可以看作是进行了归纳法的研究，书中所讲的许多特性不仅仅来源于作家个人的经验，而是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时候所得经验的总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论题得到了如此广泛的例证。

梅多斯（Medows）先生，众多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于哲理的一位，就表达过这种意见，把一个外国民族精神的正确观念传达给他人的最佳方式，就是交给他各种笔记，让他细读。这些笔记详细记录引人注目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常事件，并附以该国当地人对这些非常事件的说明。

一个总的原则是从丰富的大量事例中推论出的。这些推论可以被怀疑或否认，但是这种被引用的事例却不能置于一边，唯一的原因是，它们达到了充分的真实度，任何关于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要参照这些事例。

试图对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研究的人，最强烈地感到其中的困难。显然，许多似乎是中国人“气质”的东西，纯然是东方人的特性；然而这一点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每一位读者都必须从切身经验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现阶段，我们和中国人的交往中，有三条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渠道——这就是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知识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个，比前三者加起来还要珍贵，不过这个源泉不是对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都开放的。这就是在中国人自己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就像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图那样，在家庭中更易于了解人的气质。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所获得的关

于人民内部生活的知识，或许还不如在中国村庄住上十二个月得到的多。仅次于家庭，我们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这本书里的文章就是以中国村庄为立脚点写成的。其目的不是企图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作为一个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朴实地报告他的所见。由于这个缘故，没有作出中国人的气质可以由基督教进行改造的推论。并不假定中国人全然需要基督教，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疗治那些缺陷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人问题”现在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完全有理由认为，到二十世纪这个问题甚至会比当前更为紧迫。对于用什么方法来改进人类中这样广大的一部分人的问题，任何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都不能不产生兴趣。如果我们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将会得到至今被忽视的一系列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话，无论得到怎样的支持，都将不能成立。

劳德·埃尔金 (Lord Elgin) 对上海商界的答问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是他的话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和中肯的：“当阻挡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可以自由通行的时候，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将发现它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存在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化，不过在其它方面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同情和尊敬。在即将发生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必须在这个持怀疑态度而又聪敏的民族中奋力前进，所凭借的方式就是宣传升入天国的信仰，说明这种信仰与不离尘世相比，在公共和个人的道义上，都会提供更好的保证。”

《中国人气质》是一本描述中国人国民性的书籍。作者史密斯对中国人个性的梳理，是十分精彩的。他不像一般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那么刻板地考察问题，有许多内容，是从观察和体验中得来的。他注重中国人的日常行为、生活习俗、价值态度，对中国历史也较清楚。这部扎实的书一方面充满了对古老帝国人的爱意，另一方面，对国民劣根性给予了坦率的批评。在中国的近三十年中，他深入地、阅读报刊，结交朋友，从社会心理，到文化形态，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的世态民情，确是不易的。此书多直观的描述，理论分析恰到好处，无极端主义倾向。上至天子、官僚，下至贫民百姓，远及古文化史，近逮日常起居，所述详备，切中要害，尤其谈中国人落后习俗，读之令人生汗。

